

文庫博物館專集（七）

(CND-CM)

—— 增刊 第九十二期 ——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1.【研究评论】	抗拒遗忘	张志忠
2.【史海钩沉】	王力回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的产生	叶永烈
3.【自由论坛】	再谈“文革”	杨小凯
4.【动态交流】	迁出毛泽东遗体悼文革	张伟国
5.【往事如烟】	无稽的“抵抗投降”	仲维光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 张志忠 •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关于遗忘的论述，经常被人引用：人反对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这句话，固然深刻，却未必得到作家自己的认可。他不是一个政治批判式的作家，他更关注的是人性，人们的普遍弱点。“……这个麦瑞克正在以他的全部力量进行斗争，以确证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他们的政治斗争没有被遗忘。而与此同时，他又在竭力使人们忘记另一个人——他从前的情人。忘的意志在成为一个政治课题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人类学的课题了：人们常常怀有这种愿望，愿意重写自己的传记，改变过去，扫除痕迹，既扫除他自己的也扫除他人的痕迹。忘的意志非常不同于一种想要欺骗人的简单愿望——忘：绝对的非正义同时又是绝对的安慰。”（《六十三个词条》）

对于中国人来说，即将到来的一九九六年，也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从“文革”爆发的一九六六年算起，正好是三十周年。然而，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地感到它的分量呢？尽管巴金老人在十余年前就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尽管“文革学”的创立也不时有人提及，但是，我们的现状却是不容乐观的。当年像大山一样把许多弱者压迫得痛苦不堪的恶溢“黑五类”，变成畅销食品的品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歌曲，在沉寂了二十余年之后，又被“红歌黄唱”的歌星唱遍大江南北。在当年蒯大富、迟群等发迹的校园里，我给今天的大学生讲授当代文学，讲到写“文革”的作品，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讲述“划清界线”、“牛鬼蛇神”这些特殊的词汇，只恨那听说了几次出版消息的《“文化革命”大辞典》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空欢喜。我这种感觉，还来自我对国内外的有关“文革”问题的出版物的有限浏览和比较。

中国人是极善于归纳的，于是就有“墙里开花墙外香”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俗语。对“文革”的研究，就又一次让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感到尴尬。比较起来，外国学者似乎是领先于我们的。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有关“文革”回忆的文字就不断地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最初问世的，基本是一些揭发控诉的材料，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老一代革命家和普通民众的罪行的批判，以“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张志新烈士被害事件的披露为其中的两大高峰，前者牵涉面甚广，后者发人深省。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其顺理成章的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则是作家们自觉介入“文革”题材——“伤痕文学”是浩劫之后的直接的本能的反馈，是压抑过久的情感的自然迸发，是社会的群体性的行为。八十年代中期，叶永烈、冯骥才、师东兵、林青山、胡月伟等人的“文革”题材写作，则是具有个人性、自觉性的对历史负责的目的。叶永烈一口气推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给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立下了一个个历史的耻辱柱，史海钩沉，披沙拣金，图书馆里苦读，大江南北采访，可谓是劳苦功高，功莫大焉，在对“文革”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做系统深入研究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考虑到进行此类题材创作，一是当时仍然有种种禁箍，能否出版都是一个未知数，没有相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无法进行那样一项巨大的工程，二是及时采访某些人还有着抢救活资料的意义，像陈伯达、王洪文、江青，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叶永烈的工作就更令人敬佩。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在表现普通人的“文革”经历上，用了力气，开了先河。可惜他牵挂的事情太多，半途而废，未能善始善终，令人为之遗憾。胡月伟的连续性长篇小说《疯狂的节日》、《疯狂的上海》，在展示“文革”期间大上海的动乱和沉浮，展示一代青年人由迷失到觉悟的心路历程上，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大的深度，可读性和思想性兼而得之。

随着图书市场的活跃，图书商品化的趋向，在鱼龙混杂的出版界，近年来关于“文革”题材的书籍，也一直是受到关注的热点。其中有两套书值得一读：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的《昨夜星辰》系列丛书五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梦魇》系列丛书四种。它们都采用畅销书的作法，但是在选材和编辑上是很严谨的。前者为丛书组织了编委会和写作力量，后者则较为集中地选收了回忆“文革”的纪实文章多篇，使发表在各报刊的零散文字得到整理和保存。此外，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张涛之著）和团结出版社出的《共和国风云纪实》丛书，也对“文革”史料予以相当的注意。

但是，检讨起来，国内的“文革”类文字，离我的设想，仍然有较大的距离。其一，目前所见，大多为资料性的发掘整理，很少进入理论研究高度。在编年史方面，先后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广西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但是，二者都是有史料而无史识，谈不到研究的深度。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似是国内仅见的兼有史实和史论特点的一部专著，作者说，这本书讨论的问题是，“‘文化

大革命’仅仅是个人的错误吗？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切中要害的，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见识，都还没有具备，很难设想，在“文革”研究尚未形成气候之际，靠个人的勤勉和才思就可以回答这样宏大的时代命题。叶永烈表示，要以写出历史学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为榜样，研究“文革”，就此而言，他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呢！其二，在史料的钩沉索隐上，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去做，对于许多年事已高的当事人的采访，成为当务之急。写作中的不慎重，道听途说，歧义横生，则又在增加新的混乱。比如，受张春桥控制的特务组织，以游雪涛为首的“四二二”小组，其活动范围和危害所及，便是众说纷纭。他们是仅限于上海，还是伸手到北京？在一部纪实小说中，就有该小组在谢富治的物质支援下，对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师跟踪、窃听甚至企图绑架的描写。再比如，云南的军政一把手谭甫仁被暗杀，原由何在？在张涛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广为流传的“迫降周恩来专机”遭致杀身之祸的故事，但是在另一部纪实文学中，作者断然否定说，“迫降周恩来专机”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于理不合，于事无征，而是另有隐情。类似的歧见，在以纪实文学为旗号的“文革”题材写作中，屡见不鲜，至少表明，此类文字未必纪实，未必可信，任其发展，只会使本来就扑朔迷离充满疑团的“文革”历史更加混乱，贻误匪浅。

相对而言，我对于出诸几位外国学者之手的“文革”研究著作更感兴趣。从外部世界考察中国的“文革”，他们比我们的困难要大得多，许多我们认为是习以为常、无须多言的“文革”词汇，和见多不怪的事件，比如“牛鬼蛇神”，“夺权”，他们都要反复地理解和阐释，在掌握史料上，他们也有更多障碍，细部的错误时有所见。但是，令我感到很受启发的，一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二是他们的治学态度。他们是把“文革”作为学术研究去做的，严格的科学理性的逻辑，脉络分明。为了了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更不可理解的东方古国发生的大震荡大动乱，他们花费的心血可谓大矣。写作关于红卫兵研究的重要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①的美籍华人学者阿妮达·陈（即陈佩华——编者注），为了自己的课题，在香港结识了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并且跟他们建立朋友式的联系，通过教他们学英语，与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据作者自己的介绍，每一次谈话大约持续二到三小时，平均每人得有八到十次的谈话，然后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和翻译成英文。出自威廉姆·辛通之手的《百日战争：文化革命在清华大学》②，出自戈顿·本尼特和罗那德·蒙特培多之手的《红卫兵——戴小皑的政治传记》③，也都是经对当事人的多方采访而完成的。与求实精神相联系的是他们的学术眼光。他们往往是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己建构一个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学术框架。《文化大革命在各省》④是一部出自多人之手的论文集，分别叙述了上海、黑龙江、武汉、四川的“文革”运动。粗看起来，这四个省市，似是信手拣来，编者在前言中却论述了进行选择的确凿的理由——这四个省市，分别是其时各中央分局华南局、东北局、华中局、西南局的所在地，是各地区的运动中心，此其一。这四个省市在“文革”进程中，又有各自的代表性意义：上海和黑龙江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由造反派夺权的，武汉和四川则是在进行过军管之后，才建立起新政权的。就前二者而言，又有各自特色，上海的夺权是有中央文革成员直接介入，但上海公社的模式却未能得到毛泽东认可，未能推广开来；黑龙江所创造的三结合（其要点是对旧领导干部的新作用）及“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却成为了全国的模式——这样的理性的爬梳，开人心智，令人信服。再如，阿妮达·陈在对十余名前红卫兵的深入采访之后，依照社会学的坐标分析方法，从中选取了四人，分别界定为“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反抗的积极分子”、“顺从的积极分子”和“讲求实用的积极分子”。追踪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文革”中的表现和思想，探究他们何以纷纷卷入动乱狂潮中，从他们的这小学教育和性格特征两个方面论证了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必然性，立论严谨而富有说服力。此外，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由他与费正清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九六六—一九八二》，都是篇幅浩大、规模宏伟的力作。

尽管我们对此感到惭愧，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海外的局面，业已形成。朱多锦在一篇名为《“文革”研究在国外》的文章中比较中外的“文革”研究状况说，国外的“文革”研究是学术研究，是其研究本身，不管其所达到的深度如何，都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过程，都是其研究侧重点或阶段过程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其研究过程正不断地推向一种新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国内‘文革’研究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其所谓‘文革’研究总是很难做到是‘文革’研究本身，表现为‘文革’问题至今还不是一种学术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中国国内关于‘文革’的反思虽已经过若干阶段，但每次都是在某种政治意图的限制下以掩盖、躲闪、辩护的手法和寻找替罪羊的形式把‘文革’研究推至一种禁区，最后是宁可把‘文革’的历史交给所谓‘纪实文学’，而至于变成传奇资料，也不愿意交给学术研究而显其共象。其所谓研究总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在思想方法上，该文指出，中国的“文革”研究，总是在意识形态里绕圈子，总是在人的头脑中寻找事变的根源，总是用文化传统解释发生的一切……这就是由“文革”所固定下来的那种“人论”、“文化论”的模式。这模式又被用来反思“文革”，形成一种自我循环。我们可以说，朱多锦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从政治的需要去考察“文革”，同样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分辩说，“文革”学研究，并不能只从客观环境找原因，但是，他所指出的对于“文革”的学术研究的阙如，及思想方法的陈旧，却是切中时弊，令中国学者汗颜的。

因此，当我见到一家没有显赫名声，没有自我吹嘘，没有哗众取宠，甚至没有激烈宣言，而是真正把“文革学”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并且为它的建立做着默默的工作的刊物，不禁为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实干精神而深深感动。这就是由山东济南一群青年学者主办的《青年思想家》。在这份思想活跃、时代意识浓郁的刊物上，专门开辟有“文革学术研究”的栏目，而且已经开办数年，发表了一批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前述朱多锦的文章就刊登在该刊），团结了一群有志于“文革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像张宝明的《失掉砝码的天平——就本世纪两次“文化革命”问题致林毓生教授》，就是一篇很有见地很有分量的文字。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学界影响很大，追随者甚多。但是，恕我直言，它在开阔大陆学人的思路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思想混乱。这当然怨不得林先生，而是我们自己根基太浅，见识不高找不到自己的思考角度，盲目地作了人家的应声虫。其实，作为过来人，以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是不难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的内在区别的，后者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前者却是开创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产生了一批思想文化成果、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化大师的。可惜，林著在大陆只是获得掌声一片，却很少有不同的声音。张宝明的文章，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从几个方面对林著提出质疑：五四与“文革”的内在运作方式，一是自下而上，一是自上而下，两者的来龙去脉不可同日而语——五四的开放性和加入世界文化潮流的迫切性与“文革”的自我封闭、自我禁锢，正好是相逆而行。对待传统文化，五四反对的是它的专制、僵直和封闭，“文革”在反传统的背后一心一意地培植传统的封闭专制之文化精神，“‘不破不立’不过是反传统文化口号下‘立’传统文化精神的一块遮羞布。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五四’，传统与西方这两者文化精神处于同一平面，而且在相反方向的同一直线上形成矛盾张力，具有实际冲突的价值。而在‘文革’，文化发展的动力规律发生了根本性错位，‘破’与‘立’的内蕴根本不在一个属性领域。构不成双方对立作用的张力场，从而就失去了破与立的实际意义”。“‘五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文革’悲剧正是对它的最好说明”。我认为，这是国内学术界对林毓生教授之持论的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和对话。值得推荐的，还有《红卫兵狂飙》一书的作者江沛有关红卫兵研究的系列文章，《红卫兵心态探微》，《红卫兵大串联述略》，王静的《“文革”与大字报》等。尽管他们的理论色彩有浓有淡，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如朱多锦所提倡的那样，是在做实实在在的学术文章。比之于我们见惯的政治批判，它们的感情色彩让位于理性思考，为中国的“文革学”建设做了确实的工作。

原作者注：

① 《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阿妮达·陈著，史继平等译，

渤海湾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②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③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④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  
Harvard East Asian Manographs, 1971.

□ 原载《读书》一九九六年二月号 输入：王祝丰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王力回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的产生

• 叶永烈 •

◇ 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

中国“阶级斗争”的风声日紧一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开场锣鼓。

彭真力图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王力也出席了会议。

王力回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组成。这个小组一直叫‘五人小组’。可是，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时，觉得‘五人小组’这个名字不明确，是姚溱临时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现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成在1964年就那么叫，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当时，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以便发给全党。王力记得，他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

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找王力一起来写这篇“大文章”，写出了初稿，据王力回忆，后来《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初稿中没有。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这么一来，“文章”越做越大，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据王力回忆，“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

《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王力记得，当《通知》即将定稿，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说是要再加一段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补入《通知》。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一年之后——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王力和陈伯达，说是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临时想到的主意。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王力和陈伯达忙得团团转，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一面考虑配发一篇社论。

一切均由毛泽东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开发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两字删去；至于社论，毛泽东也意识到临时已赶不上，说“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江青建议附件不要公开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就这样，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此文由四个“秀才”——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夜赶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见报。

◇ “中央文革”的成立经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央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央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在组员之中，唯王力长期在钓鱼台工作，参加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个“老人”。

据说，在老的钓鱼台“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虑过在吴冷西、王力两人里选一个，最后选定了王力，排除了吴冷西。

“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时，共18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们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据王力回忆，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最初的名单上曾有陈亚丁，后来换成谢镗忠。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和华东局。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负责。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8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在十四号楼，那里成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改在十六号楼开碰头会，“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办公室设在那里。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在一片打倒声中，陶铸倒了，王任重倒了，刘志坚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后来，当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组员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组只剩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

□ 节选自：叶永烈：《文革名人风云录》“王力话沧桑” 输入：周其弘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再谈“文革”

• 杨小凯 •

#### ◇ 共产党语系的阴影

看到最近在《九十年代》和《开放》杂志上刊出的郑义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中国之春》最近刊出的关于文革中的“道县事件”的文章，发觉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至今仍在共产党的观念专政下，深受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政治宣传的误导。我特别欣赏苏炜关于打破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观点。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批评共产党的人，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辞典都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专政的阴影。郑义对广西文革中大屠杀中人食人的惨剧的政治背景作了非常有趣的回避。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广西的大屠杀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和地方新政权支持下杀造反派“四·二二”。而湖南发生的杀死数千人的道县事件也是湖南省当时有周恩来直接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杀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在文章中，却被作者们有意回避。而我们一般听到的故事却与共产党的宣传一致：“文革”是造反派“杀人放火”。

这种故意回避起的效果与欺骗和弥天大谎一样。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我的“图圈中的精灵”中的一章“复旧和斩草除根”（发表时误印成“复仇和斩草除根”）的几个关键印刷错误说明了这种弥天大谎的深广影响。我在文中用两个道县事件的活证人的故事说明道县的大屠杀是湖南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得势时，为了防止在大城市里得势的造反派（他们中很多是出身不好或与共产党有隙的人）与农村里出身不好的人合流推翻他们的“红色政权”，由保守派组织“红联”动员共产党和骨干分子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家族灭绝性的大屠杀。而在《中国之春》发表时，却误为“造反派在道县杀人”。

#### ◇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政治冲突

当时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支持城里的造反派，与支持

“红联”的周恩来有政治冲突，所以林彪以此事发难，攻击周恩来支持的在“二月逆流”中成立的“红联”。林彪的四十七军在湖南夺了“红联”和湖南军区的权后，曾一度支持调查道县事件，而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周恩来势力复旧后，对道县事件的调查又再度受阻。文革后，“红联”的势力成了“反极左路线”的正确路线，所以道县事件的调查更无法深入下去了。

广西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周恩来派与毛泽东对韦国清的态度表面上没有大冲突，特别在一九六九年时，毛、林、周已取得共识，要停止文革中的结社自由状态，把所有非官方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所以广西大屠杀是保守派在整个中共的支持下，以军队为靠山，屠杀造反派。文革后，造反派成了“极左路线”，自然没有人为被杀害的人说话。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都不再承认自己是造反派。例如有名的造反派何维凌、陈一咨，文革中都是利用中央文革反迫害的口号，与保守派唱对台戏的人物，文革后，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反极左路线的人物了。他们这样改变立场有其理由，但是，他们没有必要为文革中利用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造反而自惭。他们那时的造反行为实在是保守派政治迫害逼出来的。

有名的研究文革的学者陈佩华曾撰文分析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会如此一致地认同官方对文革的歪曲宣传，昧着良心指鹿为马。陈佩华特别反对巴金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她争辩道，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操纵和误导，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合法化。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 ◇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

她指出摆脱官方对“十年文革”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开始独立思考的一个条件。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而大致可分为至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通过共产党组织整肃政治的阶段，这大致从“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这个阶段中，非官方的群众结社都是非法或反革命，所有的批判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的。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发觉他发动的运动又象是一九六四年的几次运动一样，完全被保守的政府系统控制。所以他在寻找新的政治牌。最后他发现中学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的结社“红卫兵”。这种自发结社马上被官方打成非法组织和反革命。毛泽东于是选择了“结社自由”牌，公然戴上“反革命组织”的袖章支持“非法组织”。“十六条”中关于学生可以自行结社和保护少数等条款对毛泽东的新战略已有明确说明。但我当时虽也是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却根本不相信“十六条”的诚意。我觉得大概又是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套。但我当时不懂毛泽东与刘邓矛盾的确使毛泽东下了铤而走险、开放结社自由的决心。

刘邓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持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卫兵，于是马上又接过这张牌，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企图煽动这种正统观念，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郑义回忆的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正是在这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刘邓及周恩来的国务院都直接支持鼓励老红卫兵打杀黑五类的行为。周恩来的爱将周荣鑫，后来还直接给杀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财政支持。

各地的党组织纷纷效法，把党团员组织成“自发的群众组织”，他们自称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喊“只许左派革命，不许右派造反”。而那些对当局不满

的学生组织被他们称为造反派，当时这是个贬义词。毛泽东发觉结社自由牌子被刘邓接过去，于是转而支持造反派，要陈伯达等人调查红卫兵杀人的行为。毛泽东利用市民、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不满，提出反迫害，支持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批判血统论等口号，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出现了。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有多次反复，特别是林彪对镇压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有过几次大摇摆，周恩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是在不断摇摆，见风使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传到长沙，官方将其解释成红色恐怖，有意将毛泽东打结社自由牌的策略按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利的方式解释。所以我当时虽然有顶反革命帽子却不敢乱说乱动。学校里的高干子弟组织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我因为父母已被省委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属于黑七类，没有资格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成立，就把北京那一套，打骂出身不好的同学，鼓吹血统论，抄家等照搬过来。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战斗队，支持反对省委的大学生造反派。我还不参加。但直到串联学生传来消息，毛主席真的支持造反派，我才动了心。这个消息是由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证实。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在长沙市委示威，喊打倒“三相信”和罢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市委马上调动几十万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把“右派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而几天后的人民日报公然指责市委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支持造反的学生和工人。

#### ◇ 不能把帐算在造反派身上

在这同时，红色恐怖波及长沙，而红色恐怖的行刑队主要就是红色政权保卫军。所以把红色恐怖的帐算在造反派身上的确是颠倒黑白。正如陈佩华所说，陈云在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一个批示中说，对老红卫兵中干部子女在红色恐怖中杀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所以共产党批判所谓文革中的打砸抢也是个骗人的口号，对打砸抢最厉害的高干子弟，他们要重用，他们真正要清查迫害的人是对共产党不满，在文革中造了他们反的市民。

以中共的历史而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一脉相承的。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有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行为一是分散和无组织的，二是不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三是根本没有共产党的系统暴力那么惨无人道。而现在在官方的宣传中，文革的暴力全成了造反派的罪行，而保守派个个升官，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中以反迫害为名，批判血统论，和下令禁止联动（高干子女红卫兵）杀人暴行的还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他们眼看刘、邓、周接过结社自由牌，为了打击他们的政敌，由陈伯达出面发难，批血统论，解散联动的劳改营。无庸讳言，我们这些“狗崽子”，那时的确高兴，而且都打着支持中央文革的招牌揭露联动令人发指的暴行。

北京当时的“狗崽子”遇罗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着支持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口号，利用江青关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那个讲话与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四四派”据理力争。而那篇代表这种造反派“新思潮”的有名的“四三派宣言”，也成了我的“中国向何处去”批判特权阶层的思想来源之一。无庸讳言，在那个阶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确是相互利用。

#### ◇ 中国政治的几个关键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为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之间。

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制度有几个关键变化。一个是“十六条”正式规定学生可以自发结社。而这种非官方结社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反革命。有人说“红卫兵，造反派

的意识形态都是共产党的附属品，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结社。”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如果结社是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共产党，这种非官方结社受的迫害越厉害。因为这种结社被认为更危险，是所谓“托洛斯基”分子。我在坐牢时碰到过很多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政治犯，他们的下场比反共的反革命要惨得多。所以，不管文革中的红卫兵相信什么意识形态，三人为伍就可以成立“战斗队”，这本身是个很大的制度变化。

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左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布文件，正式允许工人和农民自组政治组织。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下令停止军队以外的共产党组织生活。所以到一九六六年底，政治结社是有相当的自由了。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来再三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象政党一样出现了，如不及时镇压，共产党江山会危险，他还特别用“风起于清萍之末”来警告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发动了一个全国性镇反运动。所有全国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省的造反派政党型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很多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那次镇反比共产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镇反规模都大。而文革中真正的大动乱应由这次镇压而始。一个大规模镇压自发结社的政权，怎么可能用合法和和平的方式提供秩序？那次镇压与“六四”一样，受到市民激烈反抗，很多地方军队开了枪，有记载的就有成百上千人被军队杀害。这还不包括中央文革没有透露的数字。中央文革后来在与周恩来夺权，把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杀人的事实公布出来。

文革之后，二月逆流成了正确路线，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附和中共的宣传，声称二月逆流中反对政治迫害的造反派是极左派，带着军队抓人的保守派是正确路线。这种“文革反思”有什么独立思考，有什么声张正义的良心。

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中，官方与学生的冲突还是集中在结社自由的这一点上。官方不承认“学自联”、“工自联”。至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被分成参加反动组织的和没参加组织的。据说内部文件划了一条线，对参加反动组织的一定不能宽恕。在结社自由这一点上，文革中造反派和官方的冲突与今天在朝在野派的冲突是一样。

文革中的造反派象任何革命中的政派一样，经历了无数次分化。以我的家乡长沙而言，一九六六年“八一九”事件把市民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当时的保守派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共产党、共青团。但造反派只有学生有正式组织，工人因为还不能结社，所以支持造反派的工人都是散兵游勇，与学生联系。这些散兵游勇一个个都被单位打成反革命，不少人被批斗，被关押。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文革下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和允许工人自组政治组织的文件后，正式工人组织出现了。这种组织马上发展成跨行业的政党型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这类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

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眼看压不住，又对周恩来、刘邓派的放肆不满，于是突然支持造反派平反。平反前，市民群情激愤，平反消息一来，市民兴高采烈。二月逆流中，就长沙而言，过去在“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大学生转向支持当局的镇压行动，因此造反派分为高司派和湘江风雷派。前者支持军区，后者被军区打成反革命。

湘江风雷派八月份平反后，周恩来搞了一个筹备小组名单，这个名单上有名字的造反派转而支持政府，叫工联派，这个名单上无名字的组织了一个在野联合组织，叫省无联。因此湘江风雷派又进一步分化为工联派和省无联。象法国大革命一样，自由结社和革命一旦发生，它就会朝激进的方向不断分化，直到一个军事强人用

暴力恢复秩序为止。从这点而言，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 ◇ 结社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

所以我与胡平强调的不一样。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文革中造反派中的同乡知青造反组织和合同工组织是最具独立色彩的。以湖南为例，湖南一九四九年前，很多人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中任要职，有不少名门望族，文革前这些人的子女都因成份不好考不上高中和大学，被迫下乡。他们是一群对共产党丢掉了幻想，了解社会，又有能力的人。他们文革中回城造反，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大多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知青创造了最早的伤痕文学。并排成话剧在长沙演出。我看了其中的一个，剧名是“姐姐你别哭”，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如何受共产党欺骗，在考试落第后下农村，如何被贫下中农欺侮的故事。那是个极其动人和令人伤感的故事，看戏的人无一不落泪。

我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革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得比文革中的造反派更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一九六七年中国的确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过去耀武扬威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后都成了平民，象其他老百姓一样提着浆糊桶在大街上贴大字报。而过去无权无势的人却可以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叱咤风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黑帮的人在文革第二阶段大多参加了造反派，要求当局和保守派为他们在文革第一阶段所受的迫害平反。湖南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和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就大多是文革第一阶段受迫害的知识分子。

我认识的一位的右派朋友，文革后遇到我时大批极左路线，但一九六七年夏天，我遇到他时，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林彪刚有个讲话，说“分路线是非不看出身，而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迫害是否立场坚定”。这位右派医生一九六七年与丈夫跳河自杀未死（她丈夫已死去）。文革第一阶段受尽保守派羞辱，第二阶段中参加造反派，反迫害，闹翻案。如果这些人真有独立人格，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道出真象：在文革第二阶段他们曾经利用刘邓与毛林的矛盾反迫害和造反。当然那时右派造反都是打着江青的旗号，因为江青有一个“不但要批判七十天，（“五一六”通知至八届三中全会）的刘邓路线，还要批判十七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刘邓路线”的讲话，右派们就以此讲话为大旗，向十七年的“反动路线开火”。

#### ◇ 政治从来就是相互利用

有人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受人利用的。但政治中从来是互相利用的，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而邓小平会说，造反派中的“坏人”利用了毛泽东。我在《中春》连载的我的回忆录中就用真人真事说明了，当时的确有不少有头脑的右派在自觉地利用造反派。他们不比现在一些自以为头脑清楚的人笨，他们一直在有意利用造反派反对共产党，但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人们没觉悟，而是因为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反对当权派，使造反派从自己利益出发愿意与毛泽东联手打刘邓代表的共产党。

如果你将大陆今天那些自由派人士打着邓小平的招牌反对共产党顽固派的行为与文革打着毛泽东旗号的造反派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或不独立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就以“六四”事件中的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没利用赵紫阳同情和让宣传工具自由化，学生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搞得那么大。学生运动搞大很大程度上是市民在报纸报道赵紫阳肯定学运后，才真正发生的。“被人利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套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

一九六九年，军队把造反派用武力镇压下去，以战备为借口，把所有自由结社都取缔，然后通过“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军队和保守派联手发动的运动，用残酷的屠杀，才结束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重建了共产党的秩序。这两个运动中共产党杀人无数，特别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是造过反甚至只是同情造反的人都受到残酷迫害，西方研究文革史的，有人估计那次运动死了一二百万人。而人们今天所说的十年文革浩劫中的大多数悲惨故事是发生在保守派和军队当权派的这第三阶段。而其中令人发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发动，而以周恩来为主要元凶。他自己一九七四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么多，他应负主要责任。

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被否定，唯独这个运动不能否定。很多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运动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这个运动不否定，他们死不瞑目。“清查五·一六运动”之所以不能否定，是因为周恩来是元凶，也因为清查五·一六被迫害的人在文革后的清三种人运动（实际上是清造反派运动）中又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很多人再次被判刑。

我在这里讲的不少观点，已由大陆著名不同政见者刘国凯在其杰出文章“论文化大革命”中表达过。他在文中气愤的问道，造反派绝大多数在文革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害，不少人家迫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文革前，文革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犯人却在文革后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世道吗？

#### ◇ 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更重要

今天再谈文革，不是想翻旧账，而是提醒中国知识分子，要摆脱共产党那一套话语系统，如“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十年浩劫”等等。有不少香港人对这种劝说无兴趣，而对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十分欣赏。但我却不敢苟同。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八大时是个比邓小平还彻底的唯生产论者。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就有非常彻底的唯生产力论。但一见他犯了错误，或上层内部产生政治危机，他们就不再提唯生产力了。

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要不是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

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 ◇ 造反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讲了那么多造反派的好话，我必须承认，造反派与其他人一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现在轮到我来讲造反派的坏话。造反派中的活跃分子据不少文革史专家研究，大多患有革命欢快症。他们中不少人是在秩序面前嫉妒权威，在动乱面前留恋秩序。一旦革命爆发，他们的形态就象一个初尝性爱的少女，全不顾日后分娩的痛苦。刘邓路线一九六二年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他们而言，似乎远不如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他们的结社自由更重要。为了结社自由带来的权力满足感，他们可以不惜毁灭整个社会秩序。

从这个角度而言，保守派中虽大多是些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对秩序和既有权威的尊重的确有着可贵的价值。如果你看不出这种价值，你就去仔细阅读一下日本和德国的近代史吧，在这两个民族中，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尊重，使这两个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比法国（他们大多是有革命欢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写本书，但是这种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虽然爆发了毛泽东并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这革命却象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一样，其丑无比。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被革命欢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确看似象盛大节日，小偷都成了圣人。但这个革命却充满着残暴，混乱，互相残杀，和黑暗。

我们可以用一种诚实的态度来反省革命，但是，我却不能接受中共官方那种以迫害造反派为基础的反思文革。从我对革命的反思，我有几点最重要的心得。第一点是，共产党的秩序比革命中的无秩序更可怕。第二点是，共产党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时会被人们故意地伪装遗忘，人们不再相信儒家的恕道和保护弱者的原则，而是群起欺侮迫害者。因为共产党的秩序是对连不迫害被迫害者的旁观者也要歧视的。但人们并没有真的忘记这种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松，被迫害者就会混合着革命欢快症一下突然爆发出来。当“六·四”的学生说他们是和平非暴力时，他们并不明白，一旦革命真的爆发，其后果可能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

#### ◇ 共产党的反对派在帮共产党开阀门

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共产党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开阀门，把这种革命的潜力慢慢放掉，使社会能较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政治开放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主张反对派应提出一个诉求：通过人身保护法或人权法案，使四十年来受过政治迫害的一切人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伸张正义，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要只提六四的问题，或只提文革知识分子问题。而要包括所有土改、镇反、清查五·一六等一切运动中的人权问题。对实行政治迫害的人，应该象纽伦堡法庭一样，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条法律应该对所有人都一样，不管他是文革初的红卫兵，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或一九五零年的土改干部。

我特别希望大陆的文人们在反省文革时不但注意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而且特别注意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文革前和文革第一阶段和文革第三阶段中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最后一点是针对反对派的。反对派不要以为真理全在自己手里，共产党的保守派也是有部分真理的，他们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反对派要作好和保守派平等竞争的准备。不要象共产党批文革一样，把一派讲成绝对正确，而把另一派讲成妖魔鬼怪，十恶不赦。



□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号，总 1 1 3 期

~~~~~  
【动态交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迁出毛泽东遗体悼文革

（记者张伟国报道）将毛泽东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这是五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在波士顿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举办的“文革三十年学术讨论会”提出的一项倡议。

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这项活动，共有近四十位来自澳洲、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三十多篇论文。

与会者对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架构、文革的起因、文革档案和研究书目、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文革中的经济文化、毛泽东及其文革遗产、文革的再评价、历史教训和民主化、文革的一代与世纪交替等专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

目前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黄靖博士指出，中国产生文革的制度结构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与党政并行的军队系统，依然是靠“人治”在掌控，前景堪忧。将文革搬到美国来是无法想像的，而且也并不因为毛泽东死了文革就不再发生了，从制度上找原因这是缺少权力的制衡机制。

目前是自由撰稿人的吴洪森在会上提出一个看法：文革的真正起因是中共党内毛泽东与周恩来两大派系的一场公开较量，周恩来是中共军队、特务系统、行政系统的创始人，拥有非常雄厚的权力资源，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斯大林那样的权威，他搞文革事实上是蓄谋已久的，在打倒刘少奇以后，毛泽东迟迟不肯宣布结束文革，就是想要把火烧到周恩来身上去。刘少奇、周恩来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在新闻媒体上大肆吹捧毛泽东，以作为毛退居二线的补偿，这使得毛后来有条件逾越党的正常程序，直接发动基层群众利用民间力量，来实现其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

来自中国国家计委的干部、原朱熔基的同事齐辛，介绍了朱在文革中的表现，为了博取造反派的信任，当时作为右派坏分子的朱，积极为计委公交口的革命造反公社刻写钢板，他的字刻写得非常细致漂亮，而且态度十分认真，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刻，因此被造反派头头表扬，而少吃了不少苦头。目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在收购朱当年刻印的传单。

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风云人物吾尔开希，在会上以文革参与者的“小弟弟”的姿态发言，提出文革研究要区分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他尤其对肯定文革的积极因素，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现在的改革开放之类的说法，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将文革与法西斯纳粹相提并论，指出老红卫兵犯下的罪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为甚么到今天为止没有见到一个红卫兵站出来忏悔？不少与会者也提出，文革的参与者要以德国人反思二战的勇气来反思文革！

与会者认为，一个不能在灾难中总结并汲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代价，变成对后人的警诫，使文革悲剧永远不在中国重演，上海老作家巴金多年前就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声称要彻底否定文革的北京当局，迟迟不予理睬，更有甚者，中国大陆研究和反省文革的活动，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文革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重新在官方和社会生活中抬头，所谓的“毛热”如同一个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挥之不去。



为此，出席会议的代表联名倡议：将天安门广场上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尽快改成文革博物馆，利用现有的设施，在迁出毛泽东尸体的同时，增加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彭德怀、刘少奇等众多文革受难者、受害者的惨痛史实，中共与文革有关的决议文件、文革中涉及全国性重大事件等等，还历史本来面目。

□ 原载《星岛电子日报》 5 / 23 / 1996

~~~~~  
【往事如烟】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无稽的“抵抗投降”

• 仲维光 •

〔编者的话：在读了本刊登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有位读者在他的英文来信中，希望当年参加过文革的人或红卫兵积极分子为我们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他们的经历。他说“比如，我敢肯定在海外一定有当年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指出：“我们常常在了解文革时发生的事件时忽略了文革的参加者。人们在谴责文革的疯狂时，似乎忽略了参加者心里的想法。所有的红卫兵一下子都不见了。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参加过红卫兵。”他建议我们鼓励当年的红卫兵把自己的回忆写出来，最好是“把诸如清华附中大字报这样的文件同有关的人联系起来。”这位读者的建议的工作，正是我们竭力想做而又苦于难如人意的。下面所节录的仲维光的文章，虽不是专门写文革的，可望从某一侧面提供这种联系。我们无意追究个人的恩怨，只希望给后代留一段真实的史实。也期望读者抱着同样的心态为我们提供史料。〕

刚到北京，就几次在书摊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丛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一本是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张炜卷》。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在堕落，王朔式的文学倾向是堕落，要抵抗这种潮流，不投降，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在说，原来我也不想了解。

张承志抵抗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这位当年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附中老同学，由于数理成绩不好而不能出人头地，因此对学校领导强烈地不满。天下未乱蜀先乱，还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学里的不得志的干部子弟就躁动了，还没到六月，张承志和一些干部子弟就起来造反，要求校领导紧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肃清那些“白专”学生。红卫兵的名字就是张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说过，“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这是张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当然他是否把斗争进行到了底，还没有答案，现在只能说，他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背谬，起来维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勇气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红卫兵们深知江山是他们的江山，极权社会的文化怎么能让那些资产阶级子弟分享。那些资产阶级子弟是专政的对象，是被统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们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张承志们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垂青。“三论造反”和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真不愧得到党的二十多年的培养，把从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九评苏共公开信到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以来的文风，把共产党极权社会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张承志们开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权，享受极权社会文化的天伦之乐。作为纠

察队长，张承志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不知怎的，时过三十年，我脑子中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形象，“打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张承志的父兄们潜在地形成对毛泽东一人的极权的危害，也成了毛泽东的整肃对象。毛泽东居然发动那些曾经挨整的平民起来对抗他们。刚刚肆无忌惮、耀武扬威了几个月的张承志们又滑落下来。于是张承志成了“联动”，有生以来第二次“抵抗投降”。张承志粗壮的身体，永远把他置于武打的第一线。六八年初，在他的第二次抵抗投降中，我有幸被张承志组织并为首的二十几个人群殴，两颗门牙差点被张承志一拳打掉，设身处地地体会了张承志的第二次“抵抗投降”。

平民们当时的造反虽然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但是，张承志们痛恨和对抗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平民们。张承志的前两次对抗投降都不过是对抗向平民们投降，捍卫极权制度和极权社会的文化。而这种制度和文化那时甚至谈不到受到进攻，而只是受到一些影响，或说稍微放松了一点而已。

张承志虽然在六八年没有享受到他那一圈子人的特权，和大部分平民子弟一起下了乡。但是在极权社会的主流文化政治生活中，他永远是不会被抛出来的。大学刚刚恢复，张承志就作为优秀的工农兵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承志在清华附中的经历当然使他深知，没有共产党，没有文化大革命，和那些平民子弟竞争，他是很难考入北京大学的。因此，在张承志的潜意识中更加强了“抵抗投降”那种原始冲动。

一九七五年右倾回潮，张承志和他的朋友经历了第三次抵抗投降。其实在共产党社会凡属右倾都不过是给平民稍微多一点生机，使社会能按照正常秩序运行。例如还是保送工农兵上大学，但是增加一点业务考试，但即便这样，张铁生还是交了白卷抗议。我的一位同班同学陶正，虽然出身平民却积极依附干部子弟，也是张承志同创红卫兵的同志，也是在其后插队又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下也是有了点名气的作家，那时和另外几人一起充满激情地创作了捍卫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之歌”。他和张承志们一起在那些官方垄断的刊物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草创红卫兵时的“伟大”情景。抵抗向右倾投降，这是张承志的第三次“抵抗投降”。

这一抵抗投降运动还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就发生了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帮”。此后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压倒性的舆论。尤其是掌权的很多人都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张承志们当然不敢再回忆红卫兵那美好的时光，也没有任何“抵抗投降”的冲动。他的“抵抗投降”从来没有反叛过社会和掌权的统治者。

自从七六年底后，社会和文学都产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受尽苦难的党内右倾派开始利用社会压力有限地清算过去的那些所谓极左，由此产生了带有内部批评性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其次是经过了三十年极权统治后，受西方和苏联的解冻文学影响，在一小部分青年人中产生了人性和文学的重新觉醒，出现了《今天》和《星星画展》，非极权主义的艺术潮流的再次萌芽。

然而，在这种人性的觉醒开始反抗政治压迫的形势下，张承志虽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却和陶正一样没有和上述任何一类人同流合污。一九七八年，他以“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阿勒克足球”获得第一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一九八二年以“黑骏马”，一九八四年以“北方的河”获得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其间和其后，他还获得了很多别的奖。他从模仿艾玛玛托夫开始，描写自然和“人”，绕过了令他尴尬的政治和社

会问题。因为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怀疑和反抗潮流，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最高的掌权人的暗示，因此，“知识分子”中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地“抵抗投降”。骨子里就没有桀骜不驯这一词的张承志当然更不会蛮干。值得一书的是，虽然是在这种形势下的八十年代，但张承志和陶正们却居然始终是浸淫在正统文学的河流中。正统文学的语言和技巧始终滋润着他们。他们茁壮地成长。

这是一个命途多舛的时代。八九年中国和东欧的事件虽然没有使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但是固守已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不可能，中国必须变，也只好变了。张承志本来应该成为巍巍、贺敬之、玛拉沁夫那样的作家，时运不济，他当然也要变，但是，他不会参加八九年那样的平民运动。九一年，我的一位校友说，他转向了伊斯兰教，成了教派的精神领袖。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又听说他出来反对丧失理想的庸俗。这一次，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张承志的第四次“抵抗投降”。

张承志抵抗投降，抵抗向什么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

□ 选自《真言》电子版 9 6 — 0 2 总第六期：“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第一节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余子坚（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熊 波（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萧 同（美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	温 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 [132.249.229.100]：  
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canada.cnd.org [142.132.12.100]：pub/cnd/  
hxwz）

（欧洲读者可用：europe.cnd.org [132.199.1.203]：pub/doc/cnd/  
/hxwz）

考访服务站（Gopher）：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NJSTAR ©倪鸿波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